

凯恩斯文集

下 卷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谢晓迎 梁永平 管化 李莹 译

主编 李春荣 崔铁醴

GAI GE CHU BIAN SHE
改革出版社

C52

K15

3

凯恩斯文集

下 卷

[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著

谢晓迎 梁永平 管化 李莹 译

改革出版社

人物传记

谢晓迎 梁永平 译

第一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

—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1842年7月26日生于克莱法姆。他的父亲威廉·马歇尔是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他的母亲叫丽贝卡·奥立弗^①。马歇尔家族是个西部的教士家庭，其祖上，威廉·马歇尔17世纪末曾在塞尔塔斯、康华尔做教士，阿尔弗雷德是威廉·马歇尔牧师^②的曾孙。威廉·马歇尔是德文郡教区的牧师，一个半神话式的大力神，他曾扭弯了马掌，这吓坏了当地的铁匠，他们竟然以为自己是在为魔鬼拉风箱。^③阿尔弗雷德的祖父是约翰·马歇尔牧师，他是艾克斯特语法学校的校长，他的妻子玛丽·霍特利牧师，是艾克斯特教会的副教长。玛丽·霍特利的侄子是伊

① 在为这篇回忆录做准备时（1924年8月），我得到了马歇尔夫人的大力支持，我必须感谢她向我提供了许多论文，以及一些马歇尔的私人笔记，我可以自由地从中引我想要的部分，阿尔弗雷德·马歇尔自己也留下了一些自传性的手稿，我可以尽可能地加以利用。在1924年，我已经准备好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作品的书目提要表，这发表于《经济杂志》1924年11月期上，并且重印于《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回忆录》（1925年A.C.庇古主编）。

② 他的第三个妻子，玛丽·基特森，是他在自己的教区里施洗礼的第一个孩子，他开玩笑说她应该成为他的小妻子，结果20年之后，她果然是了。

③ 有许多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爱讲的，有关于他的惊人的力气的故事，这里就是一个例子，他在一条很窄的德文郡的小路上驾着一辆矮种马的双轮马车前进，遇到了另一辆车，他解下马，把车子从障碍物上面举了过去。但我们可以从威廉·马歇尔晚年的一个小小装置中看出一些预示着阿尔弗雷德的将来的东西。老了以后，威廉变胖了，行动不便，由于痛风的影响，不能走上走下楼梯，于是他在自己常呆的房间的天花板上打了个洞，通过这个洞，他可以坐在椅子上，用滑轮到或离开他的楼上的卧室。

顿市的宪兵司令。^①

他的父亲，英格兰银行的出纳员，是个个性强硬的老派人。他意志坚定，富有洞察力，严格地符合福音派信徒的模子：瘦骨嶙峋的脖子，尖下巴上蓄着胡子，他以自创的盎格鲁——萨克逊语言写作福音史诗，这史诗在这种语言的适用圈内颇受欢迎。在他 92 载生涯中他一直独断专行，这种专制的最近受害者就是他的家庭，最早的受害者是他的妻子，但这一家庭王国的模式甚至在理论上影响到全体妇女，这位老先生写了一本名叫《男人的权利和女人的义务》的小册子。遗传性是很有作用的，阿尔弗雷德·马歇尔也没能避免父母的这种模式的影响，他对他自己的妻子怀着深深的感情和敬慕；他也正处于一个妇女解放和受教育的大背景之下，但他心中，同时又根植着种种控制妇女的倾向。

二

在阿尔弗雷德 9 岁时，他被送到泰勒商业学校读书。他的父亲看出了他的资质，就向银行一位领导请求一个名额。^② 后来他以复杂而严肃的感情回忆起吉姆·穆勒。他经常让马歇尔和他一起在学校工作，经常为学习希伯莱语工作到晚上 11 点，事实上，阿尔弗雷德经常被他的父亲布置了太多的工作，他经常说，是他的露易莎姨妈救了他的命，他和她在道利希附近共度了一个长长的暑假。她给他一只船、一杆枪、一匹矮种马，到暑假结束他回

^①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曾经去过拉夫·霍特利家的第三个侄子，拉夫·霍特利是《货币与信用》一书的作者。阿尔弗雷德从细致的拉夫那里学到的东西比从赫库利斯牧师那里学到的东西要多。

^② 你知道你是在向我要 200 英镑吗？”那个领导这样问，但他还是批准了。

家时，他又黑又壮。E.C. 德莫，^① 马歇尔在泰勒商业学校时的班长，回忆说，他在学校时，又矮小又苍白，衣着破旧，看上去被工作压弯了腰，人们都叫他“蜡烛”，他对体育不感兴趣，喜欢钻研象棋问题，^② 不喜欢交朋友。^③

由于被提升为第三任班长，按惯例 1861 年马歇尔在圣约翰大学，也就是牛津大学得到了奖学金，这本来够他 3 年之用，或者他也可以在新大学，那时隶属于伊顿皇家或温彻斯特得到同样的待遇，这符合他父亲为他设计的教会人员之路的第一步，但这并非阿尔弗雷德的初衷——这意味着得长期处于宗教经典的奴役之下。^④ 后来，他痛苦地回忆起，他专横的父亲逼他学希伯莱语到深夜，同时禁止他学习有趣的数学，他父亲憎恶数学书，但阿

① [德莫的名字从《回忆录》版本中删去了，德莫写信说，他在凯恩斯的文章中没有提供这些情况，凯恩斯是根据马歇尔留下的论文稿中，马歇尔夫人所加的批注写的，她将“蜡烛”的外号追溯到德莫，尽管德莫本人表示怀疑，但这依然可能是真的，可能是马歇尔夫人从马歇尔自己口中得出的。]

② 马歇尔夫人写道：“从还是个孩子时，马歇尔就经常犯严重的头疼，这头疼只有靠下国际象棋才能治愈，于是出于这个原因，他父亲允许他玩国际象棋，但是后来，他让阿尔弗雷德发誓不再玩国际象棋，他终生都遵守了这个诺言，但他从新闻报刊上看到有关国际象棋的消息时总是忍不住要兴奋，但他说，他的父亲要求他严格守诺是对的，否则他会想要把所有时间都用来下棋”。阿尔弗雷德有一次自己说道：“我们不能随心所欲地玩国际象棋，或是玩那些没有什么功利性，仅是让我们高兴的游戏，对于年轻人来说，进行一些增添生活情趣的活动是有好处的，无论是体力或是脑力活动，但是时间太紧迫，我们身上的担子太重。”

③ 他在学校里的主要的朋友是 H.D. 特累尔，他后来是圣约翰大学，即牛津大学的研究员，及西德尼学院的研究员，后来成了艺术家，特累尔的哥哥曾给他一本米尔的《逻辑学》，马歇尔和特累尔怀着热情读完了这本书，并且在班长桌的用餐时间进行了讨论。

④ 在阿尔弗雷德生命将尽时，他对于自己的宗教经典学习生活做了概括特征的描述：“当我在学校时，人们告诉我不要去注意希腊语的发音问题。我得出结论，费力地去记忆一些音调问题是花费时间和精力的，是不上算的，因此我就不再在字典中查发音问题，这使我受到了一生中的一个唯一的非常严重的惩罚，这告诉我，经典学习会使人不懂得时间的价值。因此我尽可能也学习数学而远离经典的学习，在后来的一些年中，我发现出色的理科学生总是很珍惜时间，而许多文科学生似乎都把时间看得很轻。我还要提一句，我的校长是一个思维开阔的人，他锻炼自己，可以用拉丁文思索，而不是用英文思考，再翻译成拉丁文。我对于他的这一点的钦佩，超过了他为我做的一切。”

尔弗雷德在他上学和放学时兜里藏着欧几里德的几何书，他读上一段，在一个人独行时复述，课间时独自站在一边，用脚趾勾划。泰勒商业学校的第6门课程涉及到微积分，这又激发了他对数学的天然癖好，数学老师艾瑞说马歇尔是“数学天才”。数学代替了阿尔弗雷德的圣经，他为父亲不理解他而深感痛苦，不，他不能在牛津大学，在死的语言中埋葬自己，他要逃——逃到剑桥去做个服务生，攀登几何学的高峰，逃离天堂。

就在这时，马歇尔的生活中出现了一位好心的叔父，愿借给他一些钱（因为他的父亲太穷，在他放弃牛津奖学金后无力借钱给他），阿尔弗雷德在靠教书得到学位后，立刻还了这笔钱。其间，是剑桥^①的帕金展览会，^②一年只需40英镑，向他打开了数学之门和剑桥之门，同样，14年后，是这位叔父给他的一笔250英镑的遗产，使他可以游学到美国，阿尔弗雷德经常提到他叔父的这笔钱的故事，在这里值得记上一笔。他到澳大利亚去寻找机会，在寻金热中在这里安了家。出于家庭带来的小小怪癖，他情愿间接去寻找利益。于是他还保留着田园诗人的气质，但使他的邻居们觉得好笑的是，他拒绝在他的领地上雇佣那些没有身体上残疾的人，于是他的工地上充斥着跛子、瞎子和残废者。在淘金狂到达高潮时，他得到了回报，那些健全的工人都迁到了有黄金的地方，查利斯·马歇尔是唯一的可以坚持经营下去的人。多年后，他带着财产回到英国，准备资助一个聪明而富于反叛精神的侄子。

1917年，马歇尔将他当时和以后的工作方法记录了下来：

① 这儿有一封贝特森博士、圣约翰的校长致赫西博士、泰勒商学院院长的信写于1861年7月15日，信中说到这个展览会，并且这封信是证明贝特森博士对马歇尔很感兴趣的早期证明——正像沃特博士后来也对他感兴趣一样，当1877年，马歇尔博士申请布里斯托尔学院的职务时，贝特森博士写道：“我非常欣赏他的那些特殊的品质，极端简单的、热情的、而又富于自我牺牲的。”

② 同年他获得了奖学金。

“我想大约是在 17 岁时一个新时代开始了，我站在里根街上，看到一个工人闲立在一个商店的橱窗前，但他的面部却显得机警而有力。于是我停下来观察，他打算在商店的橱窗玻璃上写一些有关该商店经营范围的简介，这些字将用白色的字写在橱窗上，手和胳膊的每一笔都必须非常简洁，才能达到好的效果，这大约需要两秒钟的极端集中精力，每一笔之后他都要静立几分钟，使他的心跳恢复平静，如果他不花那 10 分钟的休息时间的话，他的老板的损失可能比他一天的工钱都多。这使我产生了一个想法：我决心在我的大脑不兴奋时再不强行使用它，并且把连续运动之中的间歇看成是一种为达到绝对宁静而做出的牺牲。当我来到剑桥，可以完全为自己做主时，我决心不再连续不休息地攻读数学一刻钟以上，我随身带一些轻松的文学书籍，在休息时，我曾不止一次地读完了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鲍斯威尔的《约翰逊传》，艾齐拉斯的《阿伽门农》，这是唯一一部我可以不费力地阅读的希腊剧，鲁克里特斯的大部分作品，等等。当然，我常常读数学读得兴奋，一口气读上半小时或更多，但这时我的大脑是集中的，这仍然无害。”

在短时间内集中精力的能力，以及缺乏在长时间内连续集中精力的能力，这是马歇尔一生中的特点。他很难集中精力一下子完成一项大的工作，他也常为缺乏持久的记忆力而苦恼，在大学期间，他的数学作业总是令他苦恼不已，他在孩童时代的强烈的数学天赋，后来终于失掉了。

在剑桥大学圣约翰逊学院时，阿尔弗雷德实现了他的壮志。1865 年，他是剑桥数学学位第一批及格者中的第二名，^① 那一年的第一名是洛德·瑞利。他很快就获得了研究员的职位，他打算

^① 在第一批及格者第二名的行列中，有一些著名人物，其中包括：赫威尔，克拉克·麦克斯韦尔，凯尔韦思和 W.K. 克里福德。

献身于分子物理的研究，同时他在珀西威尔（对他充满了崇敬之情）领导下的克里夫顿学校做短期的硕士研究工作，以此谋生（并偿还他欠查利斯叔父的钱）。不久，他回到剑桥，为参加数学荣誉学位考试的学生做了短期的教练，以这种“数学”的途径，他说：我付清了我的欠款，这样，我就可以按自己的意愿自由行事了。

马歇尔在克里夫顿期间的最主要的事情就是，他与 H.G. 戴肯斯的相识，他是 1862 年来做克里夫顿大学院长助理，协助组建该校的，也是通过他，马歇尔认识了 J.K. 莫兹利。友谊为他打开了一扇通往知识阶层的门，这阶层的中心人物是亨利·斯齐威克，到那时为止，还没有证据表明，马歇尔与他的同辈人相比有什么杰出之处，但他回到剑桥之后不久，就成了一个叫“格鲁特俱乐部”的小型非正式的言论社团的成员。

格鲁特俱乐部的运行方式是，可敬的约翰·格鲁特牧师在特鲁姆平顿的家中吃过晚餐后，进行讨论，格鲁特是耐特桥的伦理学教授，从 1855 年任职直到 1866 年去世。最初的成员，除了格鲁特以外，还有亨利·斯齐威克，艾迪斯·赖特，梅耶和约翰·范。^①不久以后，皇家的 J.R. 莫兹利和圣约翰的 J.B. 珀森不久之后也加入了，马歇尔是这样记叙他与这一社团的交往的：^②

我 1867 年参加时，活跃分子是 F.D. 毛利斯（格鲁特的前任）、斯奈威克·范、J.R. 莫兹利和 J.B. 珀森……到 1867 年或 1868 年以后，俱乐部开始有些衰落，但是 W.K. 克里弗德和 J.F. 茂顿的加入给俱乐部注入了新的活力。在一两年的时间里，斯齐威克、莫兹利、

^① 要看范博士对早期会议的记述。请见亨利·斯齐威克的：《回忆录》第 134 页。

^② 参见亨利·斯齐威克《回忆录》第 137 页。

克里弗德，茂顿和我是积极分子。我们都经常参加，克里弗德和茂顿那时读了些书，但哲学方面读的很少，因此他们在讨论开始的半小时中说话很少，热衷于倾听别人的谈话，特别是斯齐威克的话。不久，他们就开始开口了，并且进步飞速，如果我能把听过的谈话中最精彩的 12 篇逐字复述出来，我将从斯齐威克和克里弗德主讲的那些晚上选出两三篇来，另一种场合可能是在格鲁特俱乐部的会议开始前的喝茶时间进行的谈话，很不巧我没有做记录（我想大约是在 1868 年），在这些谈话中经常只有毛利斯和斯齐威克说话，斯齐威克努力要将毛利斯回忆的他在 30、40、50 岁时在英国的社会和政治生涯勾画出来，毛利斯的面容神采奕奕，在他回答斯齐威克的要求和建议时，有一种特殊的圣洁的光辉。我们后来都说，我们都要感激他给了我们那样愉快的夜晚。

就是在那时，在这些影响之下，马歇尔出现了精神发展方面的危机，他在后来经常想起这个，他的学习物理的计划（用他自己的话说）“由于对哲学基本知识，尤其是神学方面的兴趣突然增加而大打折扣。”

马歇尔在剑桥大学还未毕业时，他攻读传统数学并不与他早年虔诚的宗教信仰相矛盾，他依然希望被授予神职，他那时的热情集中于向国外传教，他整个一生中都是传教士，但在很快的斗争之后，他的宗教信仰败下阵来，他在余生里，都是所谓的“不可知论者”，对那时他与斯齐威克的关系，马歇尔如是说（是在一次斯齐威克纪念会上，齐尼提·洛基 1900 年 11 月 26 日）：

尽管不是他名义上的学生，我实际上是他的伦理方面的学生，而且是住校的学生中年龄最大的，他塑造了

我。可以说，他是我精神上的父母，当我感到困惑时，我向他寻求援助；当我身陷困境时我向他寻求安慰。我也从来没有从他那里失望而归，我在他身边度过的不是普通的时光，他们帮助我生活下去。我必须克服的困难和面对的困惑，在某种程度上他也曾克服过，而他有着更渊博的知识和更强大的力量，也许在所有的感激他的人之中，我是最为感激他的。

马歇尔在剑桥任教的时间，我想正是历史学家们认为的，基督教义脱离了严肃的英国哲学世界的严峻时刻，或者无论如何，在剑桥是这样。在 1863 年，亨利·斯齐威克才 24 岁，他曾为了得到研究员资格上交了 39 篇文章，^① 曾全力去阅读希伯莱语的《圣经·旧约》，去准备关于传教行动的演讲。密尔是对那时的年轻人影响最大的知识分子，在他 1865 年写的《哈密尔顿考察》之前，^② 从来没有写过与接受宗教信仰有任何分歧的文章，这时，莱斯利·斯蒂芬是个教士，詹姆斯·沃德是个非教徒的大臣，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是个神圣人员的候选人，W.K. 克里弗德是个高级的教士。1869 年，斯齐威克辞去了他的神职研究员的职务，“以使我从教义的束缚中解脱出来”。不久以后，这些人就都不再是基督徒了。但是马歇尔和斯齐威克一样，^③ 绝对没有“反宗教”的态度。他对基督教的伦理和基督教的理想主义都持同情态度，他的文章从没有以任何形式贬低过宗教信仰，也极少有学生能清楚地讲出他对宗教的态度。在他生命将尽时，他说：“宗

^① 他 1861 年决定不接受聘职。

^② 米尔的《宗教论》中反映了他的终极观点，这文章直到他去世之后的 1874 年才得到出版。

^③ 关于斯齐威克的后半生的生活态度的最有趣的概括，见于他的《回忆录》505 页。或见于 W.K. 克里弗德的《宗教学理学》（《讲座与短文》卷 2, 244 页）的最后一段，这部书反映了马歇尔一代人的其他的特征。

教对我来说是一种态度”，也就是说，他虽然放弃了神学，但却越来越笃信宗教。

18世纪60年代后期的巨大变化是一种理智上的转变，而不是伦理上的或是感情上的转变，这种转变是属于下一代的，而在当时，争论的范围限于理智的范围内，马歇尔开始了思想上向H.J. 曼塞尔的《班普顿演讲》的过渡。曼塞尔的观点在今天看来毫无意义，但他是试图寻找基督教义的理性基础的最后尝试者，他在60年代十分重要，1858年，曼塞尔——牛津大学的教师，后来是圣保罗的教务主任，“把哈密尔顿^① 的受到康德启发的特殊的理论用于为英国教会的服务中来^②”——这是人类思想的很奇怪的自相矛盾之处，它在牛津的影响超过了50年，曼塞尔1858年的《班普顿演讲》使他成为知识分子保守派的领袖。1865年，也就是马歇尔获得了学位，开始关注有关天堂的事情时，出现了密尔的《对威廉·哈密尔顿先生哲学的考察》一书。这本书批判了曼塞尔将哈密尔顿的理论延用到基督神学之中，曼塞尔作出了回击。曼塞尔对保守主义的回护，马歇尔说“使我看到了保守派中有多少需要回护的东西”。这场大争论使得马歇尔渐渐明确了自己的想法，并驱使他进行一些玄学方面的研究，使他越来越倾向于社会科学。

同时在1859年，就是《班普顿演讲》发表的第二年，《物种起源》出版了，这本书拨开了天堂中的迷云，指出了通往地球的道路，在1860年~1862年间，赫伯特·斯宾塞的《第一原则》(现在已经读不到了)，也是起源于哈密尔顿曼塞尔的争论。这本

^① 1836年，威廉·哈密尔顿先生建立了他的谱系学，并且申请了男爵爵位，他被任命为爱丁堡的逻辑和文学教授，在接下来的8年中，他开了著名的讲座，内容是做一种危险的尝试，把从肯特和德国哲学家那里得到的东西，作为一种附加的影响增加到苏格兰的传统常识中去。

^② 斯蒂芬：《英国的功利主义者》卷3，第382页。

书从一个全新的角度，以不可知主义讨论玄学，这只是把玄学引进了死胡同，^① 玄学的不可知主义者，其进化论式的一点进步，也就是从智慧的上一代人那里留存下来的一点优势，是其实用主义的伦理观，这把新的观念推向了一个新的方向。

因此，马歇尔的注意力从玄学转向了伦理学，我想，说马歇尔从来没有超越先辈的经济学家的特点——实用主义，这可能一点没错。但令人注意的是他在解决这些问题所注意的方面——在这一点上他与斯齐威格不同，与杰文斯相反，也就是说，他的著作中几乎从不把经济学研究和某些伦理学的教义特别地联系起来。在马歇尔看来，解决经济问题并不是享受主义者的算计，但它是人类要拥有更高的才能的先决条件，不论我们说的“更高”是指什么，经济学家可以说，并且这种说法对他的研究目的而言也是很充分的，“对贫困原因的研究，也就是对相当一大部分人堕落原因的研究。”^② 相应地，改善的可能性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事实及其推论，而这正是经济学所长的；这也是经济学家们最主要感兴趣的东西”，这在讨论“有关道德和人类本质上的政治能力问题，对这些问题经济学家们并没有什么特殊的信息，他得像其他人一样行动，并且做出他可能做出的最好的猜测。”^③ 这就是他找到的最后的位置，不管怎么说，他是从伦理学研究着手才开始研究经济学的，在他走到生命的尽头对他的思想历程进

① [编者注。有关这一点，《回忆录》版本中加上了以下的三个句子：“大约在同时，《文章与评论》的出版和彼校普·克伦索被驱逐出教会，这两件事标志着教堂内部的势力也在分裂。在查利斯·莱尔的《地质学原理》出版不到20年里，甚至知识分子们，那些治学严谨的哲学家，还没有来得及好好研究读完第一章，那个时代的信仰就被击得粉碎，所有的受过教育的人们都表现出全部新的气象，后代和前辈人之间出现了鸿沟……”这段附加的话，是从J·K·摩兹利的一封非常有趣的信中摘出的，这是他在读了《经济杂志》版的凯恩斯的文章之后写的。]

② 见《原理》。

③ 同上。

行回顾时，他说^①：

“我从玄学进入伦理学研究。但对于已经存在着的社会科学的诸多约束条件进行调整并不容易。一个朋友读过许多的称为“道德学”的学科的书，他总是说：“啊，如果你真的懂政治经济学，你就不能说出来”，于是我读了密尔的《政治经济学》对它很感兴趣。我对机会不均等的合理性起了怀疑，而不是只关注人们的物质享受。于是，在那个暑假里，我走访了几个城市中最穷的居住区，一条街一条街地，走访那些最贫困的人。接着，我决定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开始我的政治经济学研究。”

关于他进入经济界的过程，在他 1917 年给《货币、信用和商业》写的序言中，他自己是这么说的：

大约在 1867 年（那时我主要是在剑桥教数学），曼塞尔的《班普顿演讲》深入我的头脑，这使我相信，人自身的可能性是最值得研究的问题。因此我花了些时间来研究玄学，但不久之后我又开始从事比较先进的心理学研究。心理学上令人感兴趣的问题是，人们更快更好地发展自己能力的可能性。这使我接触到了下面的问题：英国（和其他国家）工人阶级的生活条件通常离满足其生活需要的水平还差多远？睿智的老人告诉我，产

^① 这是马歇尔夫人从废纸篓中抢救出来的。马歇尔的一大部分思想成果都是经过了这一过程像他的曾叔父李查德·马歇尔牧师一样。据说李查德是个很出色的诗人，但总是不愿发表作品，他极反对在他死后发表自己的作品，于是他把所有文章都烧了。

出的物质资料不足以满足大众的需要，使他们有学习的闲暇和机会；他们还告诉我，我应该学习政治经济学。我遵从了他们的建议，把自己看成一个在干巴巴的事实的土地上流浪的人，我也渴望尽早回到那种纯思想的闲暇之中，但我对经济学研究得越多，我拥有的知识与我需要的知识相比就越显得少，现在，经过了将近半个世纪的紧张的学习和研究，我比开始学习时更加感到自己的无知。

在 1868 年，当马歇尔还处于玄学研究的阶段时，一种想读康德的最初版本著作的愿望使他来到了德国。“康德是我的向导，”他有一次说，“是我唯一崇拜过的人，但我从他那里得不到更多的东西：不仅是不清楚，而且社会科学的问题是无法预见和感觉到的，难道现实生活中的各种机会是可以被限定在某个范围之内的吗？”他住在德累斯顿，与一位早先曾教过亨利·斯齐威克的德国教授住在一起，^①他也与德国的经济学家们建立了联系，特别是罗斯彻。最后，贝特森博士，圣约翰大学的校长，帮助他说服了学校，为他开设了一门有关伦理科学的特别讲座，^②使他有了个谋生的职业，他不久又开始研究经济学，尽管在一段时间内，他还讲授伦理学的其他分支的短期课程——逻辑和边沁^③。

他对经济学研究的献身——他一直是这样想的，与他按照父

① 他在1870年的冬天，在法德战争期间又回到了德国，住在柏林。

② 在马歇尔去世前几个星期时，我与马歇尔进行了一次谈话，他特别关注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和贝特森博士的友善行为，以此来为自己的一生做结论。J.B. 梅耶，剑桥的第一位“伦理学教授，在圣约翰大学曾开同样的课程开过一段时间，由于当时，J.B. 皮尔森教士也在圣约翰大学，也是一位伦理学专家，在同一门课程上聘请另一名教授是一件很反常的事。亨利·斯齐威格在早些年，1867 年的“三一”节，也被聘为伦理学教授，范于 1862 年作为伦理学教授回到剑桥。

③ 马歇尔夫人回忆，在纽因海姆，在 70 岁出头时，玛丽·肯尼迪（R.T. 赖特夫人）和她不得不为他写“边沁主义和禁欲主义的对话。”

亲的愿望行事相比，对他精神的控制一点儿不差——现在他付诸实施了。他的为期两年的精神上的怀疑和骚动给他带来了很深的影响。后来的日子里，他经常提醒那些他认为值得大加指导、却怀着一种对科学漠不关心的态度进行研究的学生——他认为，人们对日常生活态度的原则，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人们拥有幸福生活的机会和人们的快乐。

在结束早期阶段，即马歇尔还没有成为经济学家那段日子之前，我们应该稍停一下，看看他那时对于人生的看法的基调，这种基调后来在他心里根深蒂固。

与他的两位同事，亨利·斯齐威克和吉姆·沃德一样，马歇尔在19世纪的最后10年里在剑桥大学任教，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属于贤人和牧师一类人，但是，也像那两人一样，马歇尔还是个科学家，具有双重本质。作为一个牧师和教士，他不比同类人更高明，但作为一个科学家，他在自己的领域内，在100多年中都是全世界最伟大的一位。但是，他想他自己更愿意在前一方面出类拔萃，这一方面应该是主；第二方面，只是仆而已。第二方面出于自身的需要而不断探索知识，第一方面只好从抽象的目标降低到实际进步的需要，鹰的锐利的眼睛和扇动的翅膀，经常被召回地面，去做一个伦理学家要做的事。

这种双重本质，正是马歇尔的弱点和他能力的混杂性的原因，也是他的目标自相冲突和精力浪费的原因，是他的观点总是存在矛盾，总是又同情又厌恶的原因。

他性格的分裂性，从另一方面来看又完全是有好处的。经济学研究似乎不需要更多的更高的天赋，据知识界认为，它与更高级的分支、哲学和其他的纯科学相比，不是一个很简单的学科吗？但是好的或说能胜任的经济学家也是稀有动物，在这一简单的学科里，却极少有杰出者！这种自相矛盾需要一个解释，也许是因为好的经济学家必须具备一种稀有的综合素质，他必须在好